

# 中国研究在过去六十年间 发生怎样的变化？

柯文 (Paul A. Cohen)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许多因素可以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技术、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我以下的讨论必然会超出中国研究怎样变化这个问题，因为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情况反映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更广泛转变进程。

## 技术因素

当打字机被个人电脑取代时，不仅擦除成为过去，而且电脑的文字处理能力使你能够复制和粘贴，将整段文字从一个地方移至另一个地方，还有许多其他技巧。与打字相比，文字处理简直是天赐之物。打字机已被归入古董之列。

然而，个人电脑不单促进了文字创作。当电脑与互联网连接后，还提供了实质的方法，使你可以做到各种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图书馆将低技术含量的卡片目录换成网上目录，使世界各地的学者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即时知道究竟某个图书馆是否有某本书。互联网还使学者能够进行关键词搜索；无需离开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查阅数码化的档案、报纸和期刊；通过网络连接全球数以千计的网站；探究令研究过程发生革命性变

化的庞大数据库；还能通过电脑与世界各地的同僚进行即时的邮件通信和文件交换。

以下的简单例子取自我自己的一个研究项目。在准备我的书《对历史的诉说：越王勾践的故事在20世纪的中国》(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9年)的最后一章时，我广泛使用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 Academic Journals)。这是一个中文数据库，可以全文搜索7,200多种期刊、杂志、时事通讯和其他资料，收录的专业范畴广泛，覆盖范围从1994年至2007年(我的研究在那一年结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数据库的威力，截至2007年1月，搜索“勾践”(东周时期越国的一位统治者)，共搜索到5549篇文章；搜索“卧薪尝胆”(与勾践故事有关的著名成语)，则共搜索到7292篇文章。显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搜索引擎和以其为核心的数码化进程，这一章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数码化几乎可以将任何东西—文本、声音、图像、人体的某些部位—转换成数码形式，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能轻易获得大量数据。它现在已经是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的基本工具。

## 政治因素

政治决定了谁可以到中国做研究；可以看到什么类型(以及范围有多广)的档案；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可以与你希望与之交流信息和想法，甚至可能合作的中国学者进行什么样的接触；作为外国人，你是否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诸如此类。我于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美国人还根本不可能到访中国，尽管你当然也可以在台湾或者其他有中国档案资料的地方做研究，比如利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或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s Divinity School Library)的传

教士论文，又或者东京的东洋文库 (Toyo Bunko)，以及巴黎、伦敦、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教堂档案。当然，那时候离电脑和数码化的出现还尚早，所以你必须亲身旅行，去档案馆阅读原始材料。这不单很不方便，而且花销也昂贵，还很耗时。

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至少对美国学者来说，在1970年代末开始改变。例如，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 为其开创性研究——1987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一书——从1979年秋天起在中国逗留了一年，对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0年代所作的义和团口述历史调查进行广泛的研究。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7年，但我与中国学者的学术接触直到1981年8月才真正开始。当时我参加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的“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社会”研讨会。虽然这是个规模非常大的研讨会，但受邀的外国人很少，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 和我是仅有的非中国与会者。这次研讨会相对自由，中国与会者在有切实根据的情况下，可以公开批评或赞扬对方，费维恺和我亦同样如是。研讨会的论文后来以中文发表，至少就我而言，并没有修改我的文章，以使其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纳。参与研讨会后，我觉得中国的通讯自由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这样说或许还是有些为时过早。

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实际研究，是在1987年。我在山东大学度过一段富有成果的时间，阅读了有关义和团的口述历史文献；在天津南开大学，我得以复制大量未发表的有关天津和河北各地义和团情况的口述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年级的学生搜集的。在我访问山东期间，我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路遥教授交谈。路教授是中国最重要的义和团史专家之一，也是山东口述历史调查的主要推动者。在谈话中，路教授直言不讳地谈到多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在采访过程中受到的限制。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可能与中国学者保持定期的交流。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已经开始花时间在国外根据自己的兴

趣进行研究。而且，非中国学者除了可以查阅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外，现在还可以对中国各地的省县档案馆的资料进行重要研究。此外，中国人也开始出版他们收藏的档案中的大量文件，使中国以外的人也很容易取得这些文件。

基于政治原因，中国政府机关偶尔会拒绝向外国人和在海外定居的华裔人士发放签证，以回应那些冒犯北京当局的出版物或公开发表的批评——他们至今还是继续如此。当局还不时限制他们查阅特定档案，故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进行研究仍然相对困难。然而，整体来说，过去六十年里，无论是在与人的接触，还是获取文献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采访在中国近代史上担当重要角色的人物，或者了解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具体情况的人，也同样是。在这方面，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障碍，但情况比六十年前已经好得多了。

另一个与政治相关，并在过去六十年里发生巨大转变的，就是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无法想像的。这改变了历史学家现在提出的问题，也导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仅在美国，2015-2016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就超过32.8万人，占同期在美留学生总数的31.5%。大多数中国学生将在完成学业后回国，这将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带来新的视角，并有望使他们对非中国专家撰写的中国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

## 社会文化因素

当我提到“社会文化因素”时，我想到的主要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新发展。这些发展影响我们对中国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些发展是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已存在的趋势的阐述。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对流行文化的

研究，包括它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和相互影响。自1985年由姜士彬 (David Johnson)、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和罗友枝 (Evelyn S. Rawski) 合编的创新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出版开始，这一领域的著作就出现真正的爆炸式增长。其后的重要著作包括：在劳动史领域，关于上海妓女、北京人力车夫、上海和天津的工厂工人等各种各样的群体；在大众传播领域，对历书、民间文学、戏剧表演和战时宣传等研究。

另一愈来愈重要的发展，是人类学领域对中国历史写作的影响（反映历史专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种普遍趋势）。同样，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1963年），性别和女性研究才刚刚开始受到人们关注，但从那时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显著的发展。正如重大著作《中国的产生：妇女、文化和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1994) 的编辑所言：“从性别角度看，中国不仅更具包容性，而且非常不同。”近年来，其他新的研究领域还有医学史和疾病史、非汉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中国海外移民史和环境史等。

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19世纪），西方人常常把中国视为另类的国家，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国拥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明体系，是个难以理解的奇怪地方。它处于一种与世界各地孤立隔绝的状态中。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错误观念一一被粉碎。最重要的是，变革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历史是一样的。很明显，通过贸易、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接触，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的联系。

近几十年来，愈来愈多人将整个欧亚大陆作为主要的新背景来观察中国。当我们把视野从大陆的最东部扩大到整个大陆时，我们看到清朝时期的中国只是若干欧亚帝国中的一个。这些帝国包括哈布斯堡王朝 (Hapsburgs)、奥斯曼

帝国 (Ottomans)、莫斯科帝国 (Muscovites)、莫卧儿帝国 (Mughals)，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 (British)。当我们开始比较中国与这些帝国，并摒弃我们早前的一些偏见时，我们对清朝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学者开始认为，清朝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且像其他欧亚帝国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大国，奉行扩张主义并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也开始观察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体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变。在某些方面，这是在重覆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已经发生的进程，只是中国起步较晚。和其他地方一样，问题并不在于，随着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愈深，它就变得愈来愈像我们。相反，当我们以更实际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开始愈来愈清楚认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往往与其他文明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出奇地相似。